

「家仇國恨，等待何時！日機炸我同胞，向其討還血債！」

——空軍第四大隊中校大隊長高志航

抗戰勝利70周年系列報道

A5 ■責任編輯：馬聰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5年8月2日(星期日)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日軍鐵蹄下 將軍夫人救難童

「如果不是吳媽媽，我們哪能享天年」

吳菊芳，是民國時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將軍的夫人。抗戰時期，吳菊芳動員力量成立了廣東兒童教養院（簡稱「兒教院」），收養了大批因戰爭流離失所的難童，成為日後重建廣東的重要力量。如今92歲的退休副教授布康，就是當年被收養的難童之一，他說，「如果當年不是吳媽媽到戰區來搶救我們出去，我們哪還有今天兒孫滿堂坐享天年的福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胡若璋、帥誠 廣州報道

1938年10月，日軍鐵蹄南下，廣州城淪陷敵手。日軍攻陷廣州的14個月中，僅空襲廣州就炸死居民6,000多人。越秀、東山、荔灣等人口稠密的平民區，更是遭逢重創。日機不但轟炸廣州，整個南粵大地也難逃敵手，粗略估算，廣東有超過70個縣都遭了不同程度的空襲。國難當頭，大人們要逃生，還要忙於生計。越來越多的孩子流離失所淪落街頭。此時的南粵大地，也是整個受難中國的縮影。

政府出資建「兒教院」

已為人母的吳菊芳，跟隨丈夫李漢魂一路北上視察，沿途看到處處家園被毀，難童的慘狀，心中著實悲痛，遂向丈夫提議，由政府出資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撫養這些因抗戰而遭遇不幸的孩子。吳菊芳的想法得到了李漢魂和廣東省政府

的支持。很快，廣東兒童教養院在戰時首府韶關成立。親自出任院長的吳菊芳，立即動員力量組織了搶救隊，潛回廣州、花縣、惠州，以及台山、新會、開平、恩平等地，拯救淪陷區的流浪難童。幾年下來，這所戰時兒童教養院，由一個總院擴大到7個分院，收養教育的抗戰難童也逾萬名。

如今已退休在家享清福的布康，便是當年被吳菊芳從廣東四會搶救到韶關兒童教養院中的難童之一。儘管如今年過九旬，憶及當年事，依然清晰如昨。

「我們是蛋家人，住在四會縣城近郊的一個小島上，日本人佔領三水以後，經江河不能通行，為了躲日本人我們一家只能逃到山上去。」布康說，蛋家無隔夜餘糧。進山沒多久，家裡連稀飯都沒得吃了。無奈之下，只好以一石米的價格，把大娘賣給別人做童養媳。

「一家人，一石米又挨得了多久呢！」很快，又有一個妹妹被送出去換了吃食。手足情深，看着姊妹們一個一個被母親送出去換了吃的，身為家中長子的布康，心中苦悶異常。

正當這一家人走投無路的時候，吳菊芳領導下的抗日難童搶救隊的工作人員到了四會。14歲的布康跟着搶救隊一路向北，前後步行了近10天終於到了位於韶關沙圍的戰時兒童訓練團。

收養抗戰難童逾萬人

「我14歲以前沒有穿過鞋。去到韶關第一天就領到兩套衣服，一雙鞋還有一盒牙粉。」布康說，他到了兒童教養院之後，陸續有從廣州、三水、台山、佛山、香港等地搶救回來的難童，小的只有五六歲，大的也不過十三四歲，一個個骨瘦如柴。

「入院初期，每天晚餐有菜有肉，米飯隨便加。但隨着戰爭進入最艱苦階段，生活越來越苦，加菜取消了，每餐只有『32粒黃豆』就着一小盅米飯吃，偶爾有兩片薄得像紙一樣的豬肉，我們就高興得像過節一樣。」

同年8月，戰時兒童訓練團正式更名為廣東兒童教養院，布康也正式成為第一屆入院的難童。在布康就讀的這1年多時間裡，吳菊芳陸續在粵北各地建立了7個分院和實驗小學部、培德小學部，兒教院學生在學總數達7,000餘人，教師600餘人。為適應兒教院畢業生升學需要，1940年9月，吳菊芳又分別成立了性質相同的實驗中學部、北江簡易師範學校和北江農工職業學校。據悉，直到抗日戰爭勝利，這裡先後收養教育的抗戰難童達到了上萬名。新中國成立之後，這些在國難中仍然受到較好教育的難童們，成為建設廣東的一支重要力量。

槍林彈雨中學習 樹枝為筆地為紙

一位名叫高旗的老人，今年也已年近九十，同為難童的他，是比布康低一屆的「兒教院」學生。高老是廣州花都人，年少時飽受侵華日軍炮火折磨，1939年6月隨着搶救隊來到韶關，那時他年僅11歲。用高旗自己的話說，吳菊芳對他來說「不是生母，勝似生母。」

在「兒教院」期間，艱苦的學習生活環境給高老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因為日軍的飛機時常進行轟炸，一旦敵機來臨，難童們便要集體躲到周邊的山林中隱蔽。如果日軍大舉進犯，老師們甚至要帶着學生進行大轉移，在轉移途中還要利用休息時間上課。久而久之，「兒教院」的學生們習慣了以樹枝為筆，以大地為紙的學習方式，一生追求真理勤奮好學的人生態度也正是在那時養成的。

儘管生活艱難，「兒教院」的教師們仍然會利用專門的課程給學生分析最新抗戰形勢，進行國防教育，「兒教院」也並沒有因為國民黨籌資創辦而進行片面的思想教育，據高旗回憶，「兒教院」的圖書館裡有豐富的世界名著，包括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老師們還經常組織合唱洗星海編寫的歌曲。自由先進的教育方式，為「兒教院」的許多學生日後參與革命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參加敵後武工隊

後來，高旗隨「兒教院」長大的八十多人一同加入了廣東的敵後武工隊。但由於「兒教院」有國民黨經濟資助背景，在當時複雜的國內形勢下，投奔武工隊的這八十多名青年並未得到隊伍的完全信任。

直到組織上派遣東江游擊隊第一支隊的政委前來了解情況，在對這八十多人的身世和苦衷詳細詢問後，明白他們「是吃人民米長大的，不是吃華僑米長大的」，大家終於打消了之前的疑慮，很快發了配槍，這批「兒教院」的革命志士終於成為真正的武工隊員。



■布康在查看當年兒教院的資料。 帥誠攝



■500多位來自粵港兩地的抗日難童們，70年後重聚，他們激動地唱起當年兒童教養院的院歌。 趙鵬飛攝

「恩情之大，不是親娘勝親娘」

1992年，年過八旬的「院長媽媽」吳菊芳不顧病體，專程從美國趕回廣州參加兒童教養院的聚會。那次聚會，對於曾經是兒童教養院這個大家庭的人來說，如同一次久別重逢的親人團聚。不少人已有近半個世紀沒見過她了。

「八十一歲的她逐一擁抱了到會的一千多個六七十歲的『孩子』們。當時年過七旬的布康抱着吳菊芳便情不自禁喊了聲『媽媽』，被習慣叫『吳媽媽』的吳菊芳當下一愣一兩分鐘。

布康對吳菊芳說，「我幾十歲的人了，第一次開口叫媽媽，就是您」，吳

菊芳張大了嘴表示不相信。布康解釋說，在他的老家有個風俗，為了讓孩子好養活，一般不會稱呼自己的父母為爸媽。「按照排行，叫叔叔嬸嬸，我的父母排行為三，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母叫『三叔、三嬸』。」

也是在這次見面中，布康從吳菊芳女兒李瀟那裡得知，廣州解放前夕，李漢魂、吳菊芳舉家移居美國，去到那裡後他們囊中羞澀，最後是在親友同僚的資助下在紐約開了一家小餐館以維持生計。

布康說，吳媽媽在經濟不寬裕的時候，還前後給他寄過200塊美金。

「第一次是我生病住院。在給吳媽媽寫信時，我提到自己生病住院了。結果她寄了100美金給我，並囑咐我要好好保養身體；第二次是我妻子去世，吳媽媽聽說後又第一時間匯來100美金，同時附言這是奠儀之資，表示哀悼。」

敘說至此，這個年邁的老人，潸然淚下，「院長媽媽的恩情之大，不是親娘勝親娘。」

四處籌物資 不幸痛失親兒

「今年，是廣東兒童教養院成立76周年，我們中最『年輕』的，也是八旬老翁了」。布康一邊跟記者打趣，一邊把帶來的書籍資料攤開來。不少書頁都已經泛黃或是霉斑點點。布康時而緊皺雙眉，時而微微張開嘴，翻着翻着就陷入了過往的沉思之中。

隨着「兒教院」難童數量的急劇增多，物資短缺、缺醫少藥等問題，讓院長吳菊芳焦慮不已。除了親自照顧生病的孩子，也常常需要奔走重慶、香港等地，籌款募捐，一走就是幾個月不能回家。有一次，當她帶着千辛萬苦籌到的錢和物資以及一大批難童穿過日寇封鎖線，平安回到家時，卻發現自己不足6歲的兒子，因感冒引發腦膜炎不幸病逝了。

「她是為了我們獻出了自己的兒子」，為了安撫她的失子之痛，布康記得，當時「兒教院」的同學們自發去摘了山花、寫了信，然後請老師集體轉送過去。也是從那次以後，「我們就集體改口叫她『院長媽媽』。」



■兒童教養院在疏散撤退的日子裡，經常在森林中照常上課。 趙鵬飛攝

廣東兒童教養院大事記

- 1938年底李漢魂將軍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夫人吳菊芳任廣東省新生活運動婦女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 1939年2月吳菊芳赴重慶向當時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孔祥熙陳述廣東兒教院初步方案，獲批撥款10萬元。吳菊芳奉聘為中央賑濟委員會委員。
- 1939年3月27日在廣東韶關沙圍村開辦廣東戰時兒童訓練團，並接收第一批學生少年連48人。
- 1939年5月29日搶救隊送來第一批難童48人。
- 1939年6月兒教院接收難童已超1,000人，其中240人從香港接收。
- 1939年8月14日廣東戰時兒童訓練團正式更名為廣東兒童教養院。
- 1939年11月廣東兒教院設二分院和中學班於廣東連縣。
- 1941年廣東兒教院已開辦了七個分院和兩個小學部，學生總數達7,000餘人，教職員工600餘人。
- 1940年起陸續開辦了力行中學、北江簡易師範學校和北江農工職業學校，在廣東兒教院學習過的難童累積達2萬餘人。

